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

学术思想编年

明清卷

陈国庆 刘莹 著



新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

明清卷

陈国庆 刘莹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ZZ6N08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明清卷/张岂之主编;陈国庆,刘莹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

ISBN 7-5613-3488-5

I. 中... II. ①张...②陈...③刘...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585 号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明清卷
陈国庆 刘 莹 著

责任编辑	侯智奇
责任校对	李小娟
装帧设计	吉人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4.125
插 页	4
字 数	528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7-5613-3488-5/B·107
定 价	全套(六册)240.00 元

开户行:光大银行西安电子城支行 账号:0303080-00304001602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7864 85233753 85251046(传真)

明清学术思想史概述

明清两代封建王朝(1368—1644;1644—1911)对中国的统治时期,社会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剧烈变革。社会变迁对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演进与繁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依据社会历史与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把明清两代学术演变过程分为以下四期。自明王朝建立至明代中期,即万历三十年以前(1368—1602);明代后期至清代初期,即明代万历三十年至清代雍正末年(1603—1735);清代中期,即清代乾嘉年间(1736—1820);晚清 80 年,即道光元年到辛亥革命以前(1821—1911)。就整体而言,明清两代是中国传统学术在遭受挫折中不断发展的时期。自先秦以来中国学术史上的思想、流派、典籍、理论与方法等在明清时期得到传承与弘扬。不仅如此,明清时代不断涌现的新思想、新流派和新的治学方法,更丰富了传统学术的宝库,为后世留下有重要价值的学术遗产,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明代前中期思想学说的基本线索

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统学术文化,它形成于宋代,学者皆主张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且以孔孟学说的继承者自居。理学家继承了孔孟学说的基本内容,并加以张扬。然而宋代理学毕竟不是先秦儒学,它与先秦儒学有明显区别。这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前中期,中国传统学术获得顺利发展。程朱理学继续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仍然是学者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在学术上取得很高成就。明初政治相对安定和经济的逐步恢复,为理学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因而理学学术流派纷呈,学术著作连篇累牍。实际上,程朱理学已经超越了学术界限,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影响。此后,理学不仅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而且作为帝王之术被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从学术史角度看,理学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对于明清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它完全可以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相提并论,与先秦儒学的道统衔接,融入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内容。

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卓越的学术成就,使理学成为宋元明三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也成为政治上处于独尊地位的学派。明代初期学术界宗法朱学的主要有两个较大的学派,一是薛瑄为代表的河东学派,他著有《读书录》、《薛文清集》;一是吴与弼为代表的崇仁学派,他著有《康斋文集》、《日录》。当时由于政治的作用,思想学术界几乎成为程朱理学的天下。然而,就一般情况而论,某一学派处于官学独尊地位,这实际使其他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逐渐被边缘化。学术上的独尊,可以使某个学派暂时获得发展机会,但是没有学术上各个学派之间平等、宽容的探讨环境,文化与学术的发展就会停顿,处于独尊地位的学派也因为缺乏论敌的诘难,而失去其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难免走向衰落。

明代前期著名学者陈献章是改变程朱理学学术理路的中间人物,他著有《白沙集》。其弟子湛若水著有《湛甘泉集》,创立了甘泉学派,他提出的心学理论,对王守仁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守仁的主要著作有《传习录》和《大学问》,其弟子把他的著作编为《王文成公全集》。他是有明一代的大理学家,心学之集大成者,



他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宋儒格物致知之学,到出入佛老之学,最终归本孔孟学说的三个阶段,在这个学术转变的过程中,“心学”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成为学术界之显学。王守仁的基本学术观点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核心观点就是把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王阳明学说接近于陆九渊的思想,当时学者常以“陆王”并称,此派与“程朱”同为明代学术思想的两大主流学派。

心学在明代中期以后传播广泛。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以后,逐渐分化为几个新学派,也就是王门后学。其中有以王艮为代表的“良知日用”派,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这些学术派别经过相互间探讨、争辩,对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化。此后,王艮的“良知日用”派再经何心隐的继承和发展,比较全面地保持了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主张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如果从正面看,王学后学的一个共性,就是高扬个体意识与主体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对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产生了积极作用。

明朝前期,考据之学也并没有中断它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考据学著作与考据学家。例如,赵谦撰有《六书本义》十二卷,对郑樵学术的分析颇为详尽,很有见解。他还著有《声音文字通》、《考古文集》等书,可以称为有明一代颇有造诣的文字学专家。焦竑著有《易鉴》、《禹贡解》、《老子翼》、《庄子翼》、《国史经籍志》、《俗书刊误》等书,对文字考订做了大量的工作。

明代中期,在心学研究兴盛的学术环境下,某些理学家另辟蹊径,使“气学”研究兴起,并成为学术界的另一个重点。薛瑄的“气学”思想源出于程朱理学,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特色,他的学说以“气中有理”为宗旨。后来,罗钦顺、王廷相等著名学者吸收了张载的“气学”思想,又继承了薛瑄的“气学”,开创了明代中期以来别具特色的“气学”学派。这说明中国学术的演变有其特

殊性,不是以所谓“断裂”方式而发生的。在很多相互对立的学术流派之间计划都有中间环节,甚至是相互沟通的关系。

在这个时期,实学崭露头角,立刻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力。实学尊崇程朱之学,批评陆王之学空疏无物,倡导经世致用,主张学术应与国家安稳和社会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实学的出现,表明我国学术开始出现新气象。此后,真正使实学学术特征得以充分体现的是江南地区颇有影响的东林学派。东林学派虽然是一个学术派别,却重视学术与政治的联系,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议论朝政和社会问题,因而受到朝廷奸党的迫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距离政治过近的学术,或者居于独尊地位,或者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东林学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明代是中国宗教发展和变化的重要阶段。儒道佛三种文化形态相互会通,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发挥各不相同的和缺一不可的作用。在当时学术界,儒释道三教融通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体现了儒释道三种学说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和社会生活中和睦相处、互相借鉴的状态。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道家学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学派,但是到明代,传统道教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其教义的思想影响力已经十分有限,而且大多与封建迷信相关。但是有一点重要变化,就是道教的明代前期已经与民间文化交融在一起,达到彼此密切融合的程度。

明代初期,官方以行政手段调配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几千年浩若烟海的典籍进行收集和编纂,许多读书人也为付出毕生精力。明代第一部官修史学著作是《元史》,编印于明洪武年间。但是明代官修史书中最重要的当属《明实录》。此书从明初即开始编写,直至明末,与明代的兴亡相始终,记录了明代13位皇帝的重要活动及朝廷主要政治事件,由于全书篇幅较大,对人物和事件的

记叙比较全面和详尽。在实录的编撰过程中,有的纂修者常常带有某些个人好恶,所编内容程度上与历史实际不尽相合。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那个时代是不可避免的。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对历史的亵渎就是对历史和后世不负责任。

明代前期类书编汇的重要成就为永乐年间成书的《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编汇工程。明成祖在位时命解缙负责编辑,初名为《文献大成》,后又收各类图书七八千种,辑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定名《永乐大典》。此外,与历史有关的类书还有《历代名臣奏议》。明代中期以后,史书和类书主要是由私人编撰,著述者比较注重历史的真实性,重视对原始资料的引用。

类书的编纂是明代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术成果有一定分量,尤其在明代后期的半个世纪里达到繁荣状态。王圻的《三才图会》,刊行于明代后期的1609年;章潢的《图书编》于1613年刊行。类书的编辑和刊行带有总结性,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发展到末期的必然产物。

明王朝建立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达到顶峰,统治集团更加注重国家机器的作用,强调采取法律武器作为巩固其专制统治的主要工具,因而封建国家的法制也更加缜密。第一部体现明代统治集团法律思想的法典是《大明律令》。此后明朝历代皇帝几乎都对《大明律》有所修订。明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条例、会典,以及明初特有的大诰。《大明律令》加重了对各种“贼盗”的惩处力度,法律条文比较精炼,重视法律的严厉性,使人们不敢以身试法。这也表示明王朝制定的法律就是为了镇压人民,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外来文化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宗教、历法、算学、地理等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

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影响了许多学者的思维,也取得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成果。

二、明末清初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

明末清初指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至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即17至18世纪的百余年间。这个时期学者辈出,学术著作众多,学术流派间相互论辩,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这种状况是明清两个朝代更迭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反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各学科领域的学者们有共同奋斗的目标,有彼此之间的师友行辈关系。当然,他们的学术思想有相同点,也有相异点,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特色,各自在学术界发挥重要作用。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传统学术发展至此已达到较高水平。先秦以来出现过的各种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在明末清初大都可以找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与归宿。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此为有清一代实学学术之滥觞,初步奠定了乾嘉汉学和晚清新学的基础。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并开始新的转型历程。总之,在清代初期,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和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均取得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就。明末清初,明朝政治日益腐败,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西学东渐,自然科学复兴,宋明理学呈现诸多弊端。进步学者反对理学空谈心性、主张注重经典文本的实学;抨击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提出社会变革主张。由此,学术界形成了实学学术。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自有其内在继承性。除极端偶然的情形外,一般而言,前代的学术思想不可能在后代突然消失,后代的学术主张也必然能在前代找到它的萌芽状态或者发展轨迹。任何学者、思想家、学术流派的传承与演变都是如此。明清之际绝大多数思想家,虽然在传统学术领域的研究重点不同,

或侧重经学,或侧重史学,或侧重哲学,或侧重政治,但有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就是他们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体系中分化、脱胎而来。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任何学者或者思想家都无法摆脱既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熏陶和影响。

中国学术史上还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当某一思想形态处于萌芽期、鼎盛期或衰落期,都有学者成为它的继承者、传播者或修正者、改良者乃至激烈的批判者。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民族处于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某些思想家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显得尤为强烈。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任何一种学术形态,从它开始生成的那一刻起,其内部就已包含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自我修正与调整的因素,已经决定了它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异化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于是,明朝末期从传统学术的母体中,有了以倡导经世致用为基本内容的实学萌芽,至清初基本形成实学思潮。这种新思潮由萌芽渐至发展,形成与理学、心学并立的新学术理念、学术体系和价值形态。显然,它是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的学术风气,而且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实学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对弊端丛生的宋明理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清初实学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风气,讲求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第二,主张经世致用为学术核心,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清初实学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文本扩大到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把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历算、典礼、制度等具体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全部列入实学学术内容之中。第三,反对君主专制和伦理纲常,提出均平天下的启蒙思想,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第四,倡导平均田地的土地制度,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明末清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

繁荣,表明中国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临盆,但是社会现实却没有给中国带来合乎逻辑的结果。中国社会要获得进步,必须接受新思想的洗礼。

总之,清初实学学术是当时社会变革的反映,引领清代学术的演变路径,启动了近代学术转型的前奏。实学学术不仅是要求学者埋头书斋,回归经典文本,而且要求学者关注天下大事和社会现实问题,追随社会的进步潮流。实学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

经学是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形式,或者说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千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都与经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提倡者也好,反对者也罢,他们争论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经学。各种学派之争、观点之争,如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理与气、心与性、道与气之辩等,都是由于学者们对儒家经典的不同诠释方法和学术理念引发而来。中国经学的发展形态,历来有几种不同观点。但从经学的社会功能来看,无非有三种不同表现方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讲,经学研究以追求务实致用的社会价值为表现形式,所谓今文经学是其代表性学派。今文经学治经,都是借助经典文本的微言,以阐发社会政治的大义。经学的学者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的层面讲,经学研究以追求经典文本真谛的学术价值为表现形式,

从学术理性和哲学本体的层面讲,经学研究以追求闻道与求道的形而上学为表现形式,宋明理学是其代表性学派。

清代学人一般把理学称为宋学,把理学家称为宋儒,宋学实际包含了程朱之学和陆王之学。程朱所谓理与陆王所谓心,在清初学者眼里,都是虚而不实的学问。为了恢复被宋儒歪曲了的理与心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回归先秦儒家原典。在清代初期及其以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回归儒家原典是以复兴经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进一步说,复古的反向问学途径和求真的学术思维,就是试图把宋明理学从儒家正统体系中剔除出去,表明清初实学直接承袭汉代经学,并力求恢复儒家原典的真面目。

对于明清之际这股复兴古学的现象,梁启超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论:“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①

但我们应把握的一点是,所谓复古,绝不是按照经学的原来形态回归到古代社会,在任何时代,倡导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或者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恢复古代的原貌。明末清初的复古,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是在复古的外衣下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初思想界的复古运动,为二百年后戊戌维新时期借复古进行社会变革的运动做了前导工作。

明末清初实学学术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西学的传入和自然科学的复兴。有学者把西学传入以康熙中叶(约169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时的西学传入大致属于前期。西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适应了当时实学学术的新要求,使中国传统学术格局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当时西方科学的传入,使清初的知识分子从传统封闭状态中摆脱出来,突破陈旧保守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一批进步学者针对晚明出现的种种弊端,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十分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采取了开放态度,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也引入科学思维和实证方法,希望西方自然科学能够成为启迪中国民众的思想武器,即试图以西学开启民智,纠正中国学术之弊端,挽救社会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

清初进步学者在继承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自然科学观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对西学思想文化和科学采取了欢迎态度。方以智对西方自然科学推崇备至,把研究自然事物的学问称为“质测之学”,他还在自己的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中,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及工艺技术。这种理性的开放精神,在读书人中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自然科学家王锡阐、梅文鼎。他们在借鉴、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天文学与数学的研究工作,对中、西之学均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主张除去中西偏见,集合众人所长,提倡学术思想和方法上的中西会通,主动汲取西学精华。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在学术文化上,实学是对明代学风流弊及古学研究的检讨;在经世致用上,实学是对均田、发展工商、自然科学研究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等问题的深层阐述。这是实学学术涉及最多的问题。实学学术与人文启蒙思潮相互关联,相互交织,但二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实学侧重于学术领域,而启蒙更侧重于社会政治、经济或者理论与意识的层面。启蒙思潮是实学学术研究成果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反映;实学学术则是启蒙思潮等社会问题在学术领域进行抽象研究的高度归纳与总结。

清初实学学术在明末至乾嘉汉学兴起之前,是一种进步的学

术形态,它贯穿清代学术史的始终。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就是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维护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促成传统学术的后期演变。

由积极倡导社会变革出发,清初实学学术意义和价值还表现在,主张复兴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开创了通经致用的治学门径,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众多实学学者和思想家,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开创了崇实黜虚的治学新风气,提出了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治学宗旨。

清初实学不仅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对清代启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诸多学者讥切时政,批判专制,探求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方案,关心国计民生,复兴和发扬了清初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学风。

清代初期形成的实学学术,在整个清代获得良好的发展。从王夫之等人到颜李学派,再到戴震;从龚自珍、魏源到章太炎、王国维,实学学术和启蒙思潮一直相互伴随,对清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清代出现的实学学术和启蒙思潮,是中国传统儒学学术的精华。它在清代历史的积极表现,充分展示了由孔孟开创的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思想精华,并在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上起到积极作用。

概括而言,清代初期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对社会和文化的反思中,揭露和批判了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危害和弊端,提出了中国社会面对世界潮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当采取的对策。因而实学学术继承、改造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三、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与学术特征

汉学主要是考据之学。清代初期学术界恢复东汉考据学,故

此时的学术主流被称为汉学。汉学从经学派别上大致属于古文经学,从研究方法的风格上又被称为朴学。清朝廷十分崇尚程朱理学,而学术界却有很多知识分子喜欢钻研考据学,这就造成清朝汉学学术繁荣发展的局面。

清代初期汉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学者们认为宋明理学偏重于讲求道德修养的伦理哲学,注重义理的阐发。平心而论,任何学术流派如果持续时间太长而又不知变通,它就一定会受到冷落。清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和顺利发展,社会承平日久,经济发达繁荣,社会生活安定,这就给读书人创造了一个安静读书的客观环境。在那个时期,大规模的反清复明活动已经基本结束,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比较平稳静谧,很适宜学者们避开社会现实问题,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清代康、雍、乾三朝皇帝对汉族官员和读书人仍怀有极大的戒心,朝廷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以此威慑汉族官员和读书人。文字狱使得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敢妄议朝政,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这样与世无争的社会生活环境,就使读书人找到一个逃避现实政治的避风港。

清代中期汉学内部有所谓吴、皖两派,它们在治学思路上不同,判断学术价值的标准也有区别,但二者治学的基本特点是大致相同的。从表面看,清代汉学家埋首经籍,不厌其烦地从事纯粹的、曲高和寡的学术研究,但从其实质讲,就是期望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能够归返原典描述的境界,追寻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

清末同光年间的学者普遍认为,清代汉学在乾隆初年以后获得迅速发展,其特点是:说经重视实证,而非空谈义理。然而,清代中期的汉学家尊崇汉儒经说,并不满足于仅仅致力音韵、训诂、考据等小学之道,他们为学的目的,是以小学见大道。作为学术研究,出发点是要对字、词、句、段有准确理解,归结点是要对儒家之

道有高度把握和理想追求。这些认识表明,清代汉学并不是简单地以考据为学术,也不是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他们自始至终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追求。

对此问题,他们的认识主要有两类,一类主张笃信汉代学者传注、固守汉代经说,以为此即闻道。另有一类学术主张是对汉代学者所作经说、传、注等提出疑问,对笃信汉代经说的作法深表疑虑。汉儒说经依赖古训、牵就师说,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甚至不着边际。所以不宜完全排斥汉代以后历代学者对儒学经典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包括宋学在内,他们的治学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或某个问题的研究中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这样的认识就比较理性,而不是绝对化和僵化。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学者或学派都有其治学上的优长和不足,而不应以其为某派而加以无限肯定或完全否定。这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也不符合辩证法原则。大多数学派之所以能够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

清代中期汉学在抨击宋学、追寻先秦圣道的过程中,明晰的表现出一种归返原典的思维特征,这种对儒学经典的崇拜,表现为舍弃注疏、追求经文、重新树立儒学原典的权威地位,在认识上,表现为归返原典的学术思维和深沉的政治期盼。

一般说来,人类思想文化尤其是学术研究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而认识的深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以否定陈言旧说和固有观念为起点。这就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学术思想的闪光促使旧观念、旧学说发生质的变革;一是否定旧思想、旧学说的冲动导致学术上的失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汉学、宋学,就其时代而言,都是学术认识上不断深化和否定之否定的产物,这是无庸置疑的。

在封建专制主义横行和泛滥的时代,学术研究领域与政治领域一样,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思维和自由创作,学术的生存、传

播、演变和发展,首先要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才有可能在社会上立足,否则极有可能被目为异端而难以生存。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与学术文化往往相互结合,学术文化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不一定直接由专制统治者加以规定,而是通过一只无形之手进行操控的,这只无形之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自身。

在乾嘉后期,皖派汉学获得很大发展,在学术界开始盛行,为清代学术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皖派后学者对于汉学的深入研究,促进了古文经学的转变。同时,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清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研究经典文本的方法更为严密,所取得的经学成就也更为突出。但他们放弃了皖派探求义理的特色,专注于文字音韵之学的研究。皖派汉学对清代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丰富发展汉学的基础上,又引起清代学术思想和研究内容的转型及进一步发展。

清代汉学是清代中期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兴起与盛行,不仅促进了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清代学术的标志。

清代汉学在嘉庆以后,由于学术自身特点和学术内在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逐渐由盛转衰。清代汉学的衰落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即19世纪上半期到20世纪初期。学者为考据而考据、为经学而治经学的脱离现实社会的专门学问,它对章句考据太多,义理发挥较少,束缚了清代汉学的不断创新和继续发展,降低了其自身存在的鲜活生命力,导致清代汉学在其发展的高峰之后,逐渐走向衰落。

清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此背景下,传统学术获得较快发展。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不仅表现为学术成果丰硕,学术思想活跃,